

一件戰國獸首玉帶鉤的前世今生

尋婧元



震旦博物館收藏的戰國〈獸首玉帶鉤〉是同時期極具代表意義的一件作品，無論其形制、工藝抑或紋飾均為同類中之精品，但其非考古發掘品的性質致使同其有關的地域信息長期不明。本文通過全面分析，將其同同期帶鉤的造型、工藝、紋樣進行對比，篩選出其可能的分佈區域，得出其應是在楚地加工、製作的觀點。同時亦梳理了上世紀以來此件帶鉤的著錄流傳等資訊。

震旦博物館上世紀八十年代入藏了一件十分精美的玉帶鉤，此件帶鉤工藝精湛、體量較大、紋飾華麗繁複可謂是歷代帶鉤中難得一見之精品。然而作為一件長期流失海外，並多次易主的文物，其出土的背景信息如今均難覓其蹤，本文即針對此件館藏文物進行較為全面的分析，探討其型式

特徵並將其同已知的出土實物綜合對比以確定其原本的地域屬性，並系統梳理從上世紀中葉至今此件文物的流傳序列。

中國古代玉帶鉤情況簡述

目前在我國境內出土的最早帶鉤約始於新石器時代晚期，其中以良

渚文化中發現的玉帶鉤最為典型（圖一），就目前情況而言學界公認的良渚玉帶鉤共計十件。（王仁湘，《善自約束——古代帶鉤與帶扣》）這些有鉤的玉質器物大多出土于墓主人的腰部，且一墓一器，同時它們的形態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帶鉤的使用需求，因此被認定為中國最早的玉帶鉤。

良渚文化中出現的玉帶鉤從數量上看發現較少有陪葬玉帶鉤的墓葬相較沒有發現玉帶鉤的墓葬等級較高。以良渚反山、瑤山發現的墓葬為例，可以清楚的證明以上觀點。

反山發現的九座墓葬之中十四號墓、十六號墓及二十號墓三座墓葬中發現了玉帶鉤，這三座墓坑長度在三·五公尺至四公尺之間，遠超過其餘的六座。此外這三座墓葬陪葬玉器品種為二十五至三十三種，其餘六座

種類為十幾至二十三種之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上）》）同樣的情況在瑤山亦是如此，共發掘的十二座墓葬中僅七號墓出土玉帶鉤，七號墓中出土玉器種類十二種為所有墓葬中最多，且玉琮數量為十七個，也遠遠高於其他墓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瑤山》）可見玉質的帶鉤在良渚時期並不是必須的服飾配件，僅有少數等級很高的階層才得以使用。

雖然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已經出



圖一 玉帶鉤 良渚文化瑤山7號墓出土 引自《瑤山》

現了玉質的帶鉤，但是這樣的史前帶鉤在後世的發展中並沒有得到繼承，帶鉤的再次出現則是在春秋中期（註一），這兩者在發展的連續性上出現了兩千餘年的斷層，同時考量二者形制和使用方式的特點，能夠發現它們之間存在明顯的差別。首先從形制來看，東周開始流行的帶鉤有鉤鈕、鈕柱這些部件，是其使用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觀良渚玉帶鉤則完全不存在鉤鈕、鈕柱的雛形。其次，東周及兩漢的玉帶鉤，勾首部分朝向使用者外部，精美的紋飾一般和勾首出現在同側；而良渚玉帶鉤的勾首反面出現紋飾，則說明其在使用之時，勾首朝向使用者內部。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春秋時期的帶鉤是以全新的姿態回歸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並不是在新石器時期的基礎上繼承和發展的。但在春秋中期之後帶鉤則經過千餘年的歷史，逐漸演變成分佈廣泛並集文化、藝術為一身的重要文物。

帶鉤的常見功能大致可分為四種：一是「束帶」之用，暨配合穿著，用來固定腰部的系帶；二是「配



圖二 壓勝錢上的帶鉤圖案 引自《中國錢幣》2011年第3期

器」之用，古人爲了方便隨身攜帶劍、刀、削、弩等工具或兵器，故使用帶鉤以方便懸掛；三是「配物」之用，這種用法同「配器」方法類似，僅佩戴的物品多爲銅鏡、銅印、錢幣等什物；第四類爲「配飾」之用，相對於上面介紹的三種功能而言，其裝飾功能大大高於實用功能，是隨身系掛玉佩等配飾器的重要媒介。（註二）

除以上四種主要功能之外，日常實用的帶鉤在神仙思想繁盛的戰漢時期也逐漸被賦予一些神秘色彩。《史記》中對鈞弋夫人的記載就是帶鉤同神秘現象的關聯，至後世同樣的故事被記錄至《列仙傳》（王叔岷撰，《列仙傳校箋》），充分體現了帶鉤同神仙思想的聯繫。東周至兩漢出土的帶鉤實物中的確存在不置於墓主人屍體附近的現象，有些帶鉤是被單獨放置在竹木所制的容器之中。如一九五三年在成都羊子山發掘的西漢墓中，除了墓主人左側腰部出土帶鉤之外，在槨的東部也發現一件滿布錯銀花紋的獸首帶鉤，發現時帶鉤被漆奩殘片包圍（註三）。戰漢時期帶鉤圖案也具有一定

的吉祥意義或辟邪壓勝功能，這一點可以在當時製作的壓勝錢幣上找到證明，目前發現的漢代壓勝錢中有三枚鑄有帶鉤圖案。（圖二）（註四）

錢幣上同帶鉤圖案一同出現的還包括吉祥文字，如「壽西王母，大宜子孫」、「樂無事，宜酒食」等（註五），這些都表明了帶鉤圖案本身具備一定的吉祥意義，因此能夠和此類文字同時被用於錢幣之上。

獸首玉帶鉤的造型特徵及年代

震旦博物館收藏的這件〈獸首玉帶鉤〉長一九·五，寬一〇·五，高二·七公分。從材質上來看本身應由青白玉料製成，但是由於它曾被多位海外名家收藏，經過長時間的人工盤玩，目前通體呈黃褐色，顯現出明顯的「熟坑」現象。（圖三）

帶鉤本體拱身、凸鈕，有弧度，這樣的造型能夠較好的貼合人體的腹部，易於佩戴。長條狀的鉤身表面佈滿規律而抽象的階梯式連線乳丁紋，此一紋飾是戰國晚期至西漢早中期玉器上十分常見的一類裝飾母題。帶鉤

的左右兩端各裝飾有一個獸首，上緣還雕琢兩個彼此相背的圓雕螭虎，下緣突出兩組鏤空邊飾，其中一組上還吊掛一個活環和獸面，形制奇巧。

戰漢時期玉器中活環的雕琢是技術進步的一大體現，它的製作除了要求玉工有精湛的技藝，同時在「識材成器」方面也十分考驗玉工的設計思維。一般而言活環的雕琢需要平面面積較爲寬大的玉料，這樣玉工就可以先在平面玉料上訂線打稿，再採用鏤雕和透雕相結合的方式，最終完成活環的製作。如果玉料本身平面的面積不大，如何設計才能成功的制成活環？這則需要玉工憑藉其經驗重新對玉料進行設計和利用，震旦博物館收藏的此件〈獸首玉帶鉤〉正是在玉料看似不能夠滿足設計的情況下，由玉工巧妙的進行空間的變通而達成。如果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帶鉤懸垂的獸面能夠向下完全收折於帶鉤底部，並且收折後獸面與鉤鈕的高度相當，同時二者玉色及紋理連貫，由此可以推測出帶鉤下部的獸面與活環是用鉤鈕左邊的玉料製作而成。（圖四）



圖三 獸首玉帶鉤 震旦博物館藏



圖四 獸首玉帶鉤一體成型工藝 震旦博物館藏

附表 戰國至西漢活環裝飾玉器統計表

名稱	器物	時代	出土地點/現藏地點
龍形玉佩		戰國早期	山西省侯馬市西高祭祀遺址779號坑
十六節龍鳳形玉飾		戰國早期	湖北省隨州市曾侯乙墓
四節龍鳳形玉飾		戰國早期	湖北省隨州市曾侯乙墓
四連璧		西元前五世紀	大英博物館藏
龍形玉飾		戰國	洛陽古墓
工字形玉飾		戰國	陝西省長安縣韋曲戰國墓

也就是說，此件帶鉤在製作之初，玉工擁有的本來是一塊較厚的玉料，他巧妙的將鉤鈕左邊的玉料由上至下橫剖至四分之三的深度，用鏤空技法把未切穿的四分之一玉料透雕為活環，即可將已剖分的四分之三玉料翻轉下來製作獸面，成為帶鉤下方的垂飾。（吳蒙海，《中國古代玉器》）這種一體成形的方法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玉料，將體積通過剖切的方式轉換為面積以適應設計的需要，同時也能夠呈現出活環連接的裝飾效果。

從造型上來看，春秋中期至魏晉時期的帶鉤可以分為六種類型，它們分別是：水禽形、獸面形、耜形、曲棒形、琵琶形和長牌形（註六），這六種造型的帶鉤，其流行的時代也各不相同。通過進行對比，震旦博物館收藏的〈獸首玉帶鉤〉應屬於典型的長牌形，而就目前的出土資料來看，各種材質的長牌形帶鉤僅見於戰國中晚期的遺址之中，加之〈獸首玉帶鉤〉本身紋飾的特徵，因此可以斷定其製作的實際年代應為戰國晚期前後。

獸首玉帶鉤的地域屬性

震旦博物館收藏的〈獸首玉帶鉤〉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被著錄以來，針對其出土的地點並無記載。目前考古發現的帶鉤，分佈十分廣泛，遍佈二十多個省區，如何能準確的還原〈獸首玉帶鉤〉的地域屬性就顯得十分必要。在此，本文希望通過運用考證、對比的方法，針對其造型、工藝以及紋飾進行剖析，找出其大致的分佈範圍。

一、造型與地域屬性

首先從器物的造型入手。造型除了受到時間因素的影響之外，也受到地域因素的影響，經常可以發現某一種造型的器物僅僅在特定的區域內得以流行。因此，觀察器物造型特徵並將其同出土實物進行對比是判斷地域屬性的關鍵所在。根據以上對獸首帶鉤的造型分析，我們得知其為流行於戰國中晚期的長牌形帶鉤。如果長牌形帶鉤分佈的區域比較明確，則可以推斷出獸首帶鉤的地域屬性。根據王仁湘先生的研究，長牌形帶鉤大致有兩個較為集中的分佈區域：一是楚墓

中發現較多；二是三晉及周都地區，此外戰國秦墓、韓墓中僅有個別出土。（註七）所以，如果單一從造型特徵入手，我們可以鎖定〈獸首玉帶鉤〉原先的出土地可能為楚地或周都三晉等中原地區。

二、工藝與地域屬性

其次可以從製作工藝方面入手。在技術交流相對緩慢的戰國時期，一種工藝從誕生到全國範圍的流行往往需要很長的時間，或者根本無法流行全國而僅僅限於地區內部發展。因此器物的製作技法也是判斷其地域屬性的一條線索，如果〈獸首玉帶鉤〉體現出的某種加工工藝具有地域性特色，那麼我們同樣可以在工藝層面上推導出其原先的出土區域。〈獸首玉帶鉤〉上最具有特色的工藝無疑是那個懸有獸面的活環。玉器中使用鏈環的技術可以追溯至晚商時期江西省新幹大洋洲墓葬出土的一件玉羽人，這件玉羽人頭部雕琢三個相互套嵌的鏈環，鏈環活動的範圍較為有限。（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九》）至春秋時期則出現了活動較為靈活的鏈環，如

江蘇省吳縣通安嚴山王陵出土的一件拱形玉飾，其左側就雕琢一個活環。
 (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7》)縱觀戰國至兩漢的玉器，活環也不是一種常見的裝飾技法，這大概和它的製作難度相關。因此可能只有部分地區的工匠掌握此項技術。目前大致可知戰國至西漢時期裝飾活環的玉器發現共計十二件，具體如附表所示：

通過以上的統計，可以得知活環的加工工藝到戰國至西漢時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從其形制上看又可細分為兩大類：一是活環附著於器物之上，具有一定的裝飾效果，通常為圓環偶有裝飾扭絲紋；二是活環附著於器物的兩個部分之間，具連接效果，通常鏈環的橫截面呈方形。(圖五)總體來看兩種技法雖形制上有所差異，但其去料掏空成環的基本工法則存在一定的共通性。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種形制其對工法的要求更為考究，經常會採用「一體成型」的雕琢技法，震旦博物館收藏的這件玉帶鉤即是此種情況。從附表我們還可以歸納出帶有活環裝飾玉器的分佈範圍，大致集中在楚地及周都地區。

根據上文的兩點分析，我們得知同震旦博物館藏〈獸首玉帶鉤〉相近或相同造型及工藝的帶鉤相對集中於楚地及周都中原一帶。如果再對獸首帶鉤的紋飾及裝飾母題進行討論，並比照相似紋樣帶鉤出土的地點，就又能為判定其地域屬性提供新的線索。目前並沒有已知出土帶鉤同獸首帶鉤擁有完全一致的紋樣，但是如果將獸



圖五 一體成型工藝的龍形玉佩 侯馬西高祭祀遺址出土 引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3》

三、紋飾與地域屬性

如果將這兩件玉帶鉤的裝飾紋樣進行拆解，會發現其同震旦博物館藏玉帶鉤的裝飾要素高度一致。首先來看勾首及勾尾部分，這兩件玉帶鉤的勾首和勾尾部分雕刻著同震旦博物館藏玉帶鉤一致的獸面。具體來看勾首的獸面耳呈闊耳狀，雙目較圓並略微突出(圖八)；勾尾的獸面頸部無耳，取而代之的則是兩根較長的角，眼角上揚呈杏核狀。(圖九)

震旦博物館收藏的〈獸首玉帶鉤〉其裝飾要素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一、勾首及勾尾的獸首；二、活環連接的獸面；三、勾身上側的圓雕螭虎；四、勾身上滿布的「階梯式連線乳釘紋」。筆者搜集了戰國至西漢出土帶鉤的圖像資訊，通過比對後發現震旦博物館藏〈獸首玉帶鉤〉同安徽巢湖北頭山一號西漢墓出土的帶鉤有著諸多共同點。北頭山一號墓為西漢初年(文景時期)居巢縣的最高地方長官之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其中包含玉帶鉤兩件。(圖六、七)

名稱	器物	時代	出土地點/現藏地點
連環璧		戰國	洛陽古墓
黃金龍鳳形緣飾穀紋玉盒		戰國晚期至西漢	洛陽金村古墓
雙環鈕印		戰國晚期至西漢	哈佛大學博物館
玉卮		西漢	安徽省巢湖市北頭山漢墓
玉鋪首		西元前三世紀	江蘇省徐州市火山劉和墓

獸首玉帶鉤的流傳及著錄

震旦博物館所收藏的〈獸首玉帶

鉤〉原屬於美國的班氏夫婦 (Mr. and Mrs. Richard C. Bull)，由於班氏夫婦歷任美國費城大學博物館董事，因此此件帶鉤於一九六二、一九七八年曾兩次展出於費城大學博物館。除此之外，它也會經在海外知名博物館舉辦的展覽中被多次借展。如一九六三年展出於克利夫蘭美術館，一九七〇年借展於美國的 Asia House Gallery，一九七五年又前往英國的維多利亞阿爾伯特美術館展覽。(註十)

再加之在北頭山漢墓中亦發現活環裝飾的玉卮(圖十一)，這也間接說明了活環的工藝對於此地的玉工而言是已經掌握的裝飾技法。因此通過多方面的對比我們認為震旦博物館藏玉帶鉤同巢湖北頭山漢墓出土的玉器其在地域屬性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

北頭山一號漢墓所處巢湖市內，此地在戰國時期隸屬楚國領地。(註八)雖然該墓時代為西漢早期，但是總體來看深受戰國楚文化影響。北頭山一號墓的墓葬形制較為特殊，其墓口為臺階式，這種樣式在戰國晚期楚墓中較為普遍，此外該墓的槨周填塞白石膏泥，是典型的楚人埋葬習俗。(註九)同時北頭山一號墓出土玉器的紋飾風格、雕刻技法均同安徽長豐楊公地區戰國晚期楚墓發現的玉器極為相似。因此通過以上造型、工藝及紋飾的分析，我們認為震旦博物館藏〈獸首玉帶鉤〉應為楚地所產器物。

這件〈獸首玉帶鉤〉還見諸於海外的各類出版物。一九五〇年，倫敦大學著名學者 S. Howard Hansford

在 Chinese Carved Jades 一書中記載了此件帶鉤。而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由 Alfred Salmony 所著的 Chinese jade: through the Wei dynasty 也針對這件文物進行了著錄。曾任東方陶瓷協會會長的 Mary Tregear 也在其所著的 Chinese Art 中亦有所記述。一九八三年蘇富比拍賣公司在紐約舉辦班氏夫婦收藏文物拍賣專場，此件玉帶鉤被臺灣收藏家購得，因緣際會最終入藏上海震旦博物館。¹⁰

作者為震旦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圖十 A型玉帶鉤圓雕螭虎局部 北頭山1號墓出土 引自《巢湖漢墓》



圖六 A型玉帶鉤 北頭山1號墓出土 引自《巢湖漢墓》



圖十一 北頭山1號墓出土帶有活環工藝的玉卮 引自《巢湖漢墓》



圖七 B型玉帶鉤 北頭山1號墓出土 引自《巢湖漢墓》



圖九 B型玉帶鉤勾尾部分局部 北頭山1號墓出土 引自《巢湖漢墓》



圖八 B型玉帶鉤勾首局部 北頭山1號墓出土 引自《巢湖漢墓》

其次再來看勾身的部分，震旦博物館收藏的玉帶鉤勾身遍佈階梯式連線乳釘紋，最為特色的是在勾身的上方圓雕兩隻螭虎，這種裝飾形式在同時期的帶鉤中十分罕見，巢湖北頭山出土的兩件帶鉤中，較大的一件長牌形帶鉤其勾身上就出現了圓雕的螭虎一隻(圖十)，而較小的一件帶鉤其

註釋

1. 王仁湘，《帶鉤概論》，《考古學報》一九八五年第三期，頁二六七—二二二。
2. 王仁湘，《古代帶鉤用途考》，《考古》一九八二年第一期，頁七五—八二。
3.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成都羊子山第一七二號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五八年第一期，頁一一〇。
4. 劉春生，《趣味盎然的早期壓勝錢》，《中國錢幣》二〇一〇年第三期。
5. 公柏青，《帶鉤與壓勝》，《中國錢幣》二〇一二年第三期，頁二二六—二四〇。
6. 同注一。
7. 同注一。
8. 譚其驥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原始社會、夏、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地圖出版社，一九九六，頁二四。
9.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巢湖市文物管理所，《巢湖漢墓》，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七，頁一四七。
10. The Christie's, Important Chinese Works of Art: The Collection of Mr. and Mrs. Richard C. Bull, The Christie's New York Galleries, 1983, p. 200.